

今本《楚辞》与刘安的关系及版本源流新探

漆子扬

(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, 甘肃 兰州 730070)

[摘要]淮南王刘安首次整理编订并题名《楚辞》,后经刘向增补,东汉又经王逸再次增订。后代大多数学者认为《楚辞》成书于刘向,而定名于王逸。检讨《楚辞》诸篇的抒情主体、作者姓名,《招隐士》的主题思想、以及《史》《汉》的有关记述和《楚辞释文》目录的编排次序,证明“楚辞”在汉代至少经过了从刘安、刘向到王逸的三次编订,唐宋之际又一次进行了整理注解,迄南宋洪兴祖才形成了今天通行的《楚辞》文本。

[关键词]刘安;《楚辞》;编订关系;《楚辞释文》;成书过程

[中图分类号] I206.2

[文献标识码] A

[文章编号] 1000-5102(2008)01-0074-05

《楚辞》编订成书和定名具体时间,学术界迄今未有定论。总括诸家之论,最具代表性者有四:

其一,以王逸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《楚辞》是“光禄大夫臣刘向集”^[1],且“刘向、王褒之徒咸悲其文,依而作词,故号为‘楚词’”^[2]。也就是说《楚辞》的编订和命名是由西汉刘向完成的。从东汉到现当代大多数《楚辞》的注释本和论著都承继了王逸的论见。

其二,金开诚、葛兆光先生肯定“淮南王幕府对‘楚辞’有收集传习之功”^[3],但认为首次编订者是王逸。董乃斌等先生则认为,不仅首次编订者是王逸,“正式确立了‘楚辞’这一文体专名”也是在王逸时候^[4]。张伯伟先生说“《楚辞》的纂辑,可能经由刘安、刘向之手,最后为王逸”编订^[5]。

其三,汤炳正先生和李大明先生提出,汉初流传着屈原《离骚》和宋玉《九辩》的合集,编者可能就是宋玉,这个合集流传在吴越一带。刘安及宾客在合集的基础上增辑了他们收集的作品,“并将这个增辑本定名为《楚辞》”^[6]。两位先生首次提出《楚辞》由刘安命名的宏论。

其四,姜亮夫先生认为,“屈、宋之作辑录为一书,当出刘安”^[7],姜先生肯定了刘安对《楚辞》的首次编辑权。

我们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,通过对有关文献的钩稽考述,对《楚辞》的编订过程、流传过程、版本源流,及《招隐士》主题思想的系统梳理,认为淮南王刘安不仅是第一个全面研究评价屈原的人^[8],而且《楚辞》书名的首创之功也在他,他首次整理编订并题名《楚辞》,而后经刘向增补,东汉又经王逸再次增订。“楚辞”在汉代至少经过了从刘安、刘向到王逸的三次编订,唐宋之际又一次进行了整理注解,迄南宋洪兴祖才形成了今天通行的《楚辞》文本。

一、今本《楚辞》在汉代的三次编订

《楚辞释文》篇目次序和今本王逸《楚辞章句》的篇目次序分别为:

1.《楚辞释文》篇目如下:

离骚第一、九辩第二、九歌第三、天问第四、九章第五、远游第六、卜居第七、渔父第八、招隐士第九、招魂第十、

[收稿日期] 2007-11-02

[作者简介] 漆子扬(1964-),男,汉族,甘肃武山人,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,文学博士。

九怀第十一、七谏第十二、九叹第十三、哀时命第十四、惜誓第十五、大招第十六、九思第十七。

2. 今本王逸《楚辞章句》的篇目如下:

离骚第一、九歌第二、天问第三、九章第四、远游第五、卜居第六、渔父第七、九辩第八、招魂第九、大招第十、惜誓第十一、招隐士第十二、七谏第十三、哀时命第十四、九怀第十五、九叹第十六、九思第十七。

今本《楚辞补注》(以下简称《补注》)的篇目次序和《楚辞释文》(以下简称《释文》)目录的差异,为我们认识《楚辞》的编辑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。据白化文先生考述,宋代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附录的大约成书于五代时期的《楚辞释文》(以下简称《释文》),其篇目的目录与晁公武、陈振孙所著录的《楚辞释文》的目录完全相同。汤炳正先生又根据王逸注:《九章》皆解于《九辩》中,《七谏》已解于《九章》中,《哀时命》已解于《七谏》中,他认为“《释文》篇第,盖旧本”。^[9]汤先生所说的“旧本”至少告诉我们:和《释文》目录次序相同的《楚辞》文本,应该是指汉魏时期的通行本,可能同初本《楚辞章句》(以下简称《章句》)是同一个系统,而且比现在所传的《章句》本肯定要早。

如果按《楚辞释文》篇目的先后顺序,作者排列的次序依次为:屈原、宋玉、屈原、刘安;宋玉、王褒、东方朔、刘向;严忌、贾谊、屈原(一说景差)、王逸。很显然这个篇目次序是比较杂乱的,但这个杂乱的篇第却清楚地表明,《楚辞》至少在唐以前经过了三次编订。我们结合今本王逸《章句》的篇目编排次序,对三次编订可以作这样的推断:

第一次编订时,收录了《释文》目录或者说初本《楚辞章句》目录中从《离骚》第一到《招隐士》第九的作品,时间跨度从战果到汉初,应该是淮南王刘安所辑,或者说“由淮南王幕府所编成”^[10],共计 27 篇,并首次定名《楚辞》,我们姑且称为古本《楚辞》,或者旧本《楚辞》。其中除了刘安自己的《招隐士》和宋玉的《九辩》两篇外,其余 25 篇都是屈原一人的作品,而且汉代只有刘安一人,李诚先生感慨地说,“一眼就可以看出,刘安的《招隐士》原来是属于汉人拟楚辞

之首”的作品^[11]。刘安编辑的痕迹非常明显。这个本子大概就是西汉中晚期文人学者中流行的读本,“东方朔、刘向等人所读,就是这个传本”^[12]。

第二次编订时,收录了《释文》目录中《招魂》第十到《九叹》第十三的作品,并沿用刘安定名的《楚辞》,编订者为西汉末年的刘向,共计新增了 26 篇,其中《九叹》9 篇为刘向自己的作品,其余 17 篇为宋玉、王褒、东方朔三人的作品。假如宋玉曾经编过合集,他应该将自己的两篇一次收录。假如首次是刘向编订,也不该将《招隐士》放在宋玉两篇之间。说明宋玉的《招魂》是刘安编订本之后他人补入的篇目。

第三次编订时,增录了《哀时命》第十四到《九思》第十七的 12 篇作品,其中《九思》9 篇为王逸的作品,其余为严忌、贾谊、屈原(一说景差)三人的作品,编订者为东汉初期的王逸。王逸不仅对古本《楚辞》进行整理编订,结合东汉的通用语言对全部作品做了注解,各篇之前撰写序言,指明作者、写作时间、命题意义等,并取名《楚辞章句》,这就是最早的《章句》底本。

如果《释文》目录所反映的是王逸《章句》的旧本面貌,我们对汉代的三次编订可以作这样的评判:根据古书编订的通例,“楚辞”第一次编订应该将宋玉的作品放在屈原作品之后,不该放在屈原作品的中间,可能当时刘安把《九辩》也当成了屈原的作品。第二次编订的次序应该是:宋玉、东方朔、王褒、刘向。东方朔生活在汉武帝时期,王褒生活在汉宣帝时期,按照人物生活时间和作品创作的大体年代,东方朔应在王褒之前,不知何故,第三次编订时刘向将王褒排在了东方朔之前,不能不说是刘向的一个失误。第三次编订,如果按照作者生活时代的先后顺序,应该是:屈原(一说景差)、贾谊、庄忌(严忌)、王逸。因为,庄忌主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,和刘安同时,晚于贾谊,不应该放在贾谊之前,这是王逸的失误。

《释文》目录次序的《楚辞》辑本的篇目次序,或者说王逸初本《章句》的编订次序,出现杂乱的原因,我们认为大概有两种可能:一种可能是刘向编订本身就不严谨;另一个可能是刘向编订比较严谨,而王逸编订时出现失误。客观分析,前一种可能性较大,西汉以后的学者有一个传统就是迷信前人,尊重前人。刘向在刘安原本

上增补后,刻成竹书,后人在原基础上很难进行更改,也就只好保持原貌,将错就错,而且王逸在前人错误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错误。

此外,我们还注意到,今本《楚辞》在原文与补注之间插入了五臣注和颜师古的注,估计在王逸与洪兴祖之间还有一位唐宋时期的人对《楚辞》做过集解整理工作。假如整理者是宋代以前的人,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《释文》的编订者。《章句》流传过程中,很多人为之作注,到晚唐时王逸的和有些后人的注已经混在一起,他保持了《章句》本编排篇次,作了集解工作。假如此人是宋代人,他应该是开创《补注》本的先行者,原来编排次序的失误很有可能也是他纠正的,并将王逸的注和他人的注混在一起,到洪兴祖时已经很难分辨伯仲。洪只有把五臣注、颜师古的注和王逸的注相区别,自己的阐发列于“补曰”之后,使之与前文相别不乱。我以为这个无名氏很有可能是晚唐五代人,生活时代与《释文》属于同一时期。

洪兴祖的整理编订非常严谨,纠正了前人编排的失误,按照作者生活时代的前后次序重新进行编排。其次序依次为:屈原、宋玉、景差(屈原)、贾谊、刘安、东方朔、严忌、王褒、刘向、王逸。很显然,如果《大招》为景差的作品,这个编排次序是科学严谨,洪兴祖将《大招》放在《招魂》之后,看来他倾向于景差所作。这个本子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今本《章句》,也就是《补注》本。说明《补注》本系统在流传过程中至少经过了五次整理编订。至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没有著录《楚辞》,原因“在于《楚辞》体例本身”^[13],而非其他,力之先生曾有论述,此处不赘。

二、刘安编订《楚辞》文献补缀

通过以上论述,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汉代整理编订注释“楚辞”的人不少,但是《章句》本是从刘安、刘向的这条线发展来的。因为王逸看到的《楚辞》本子是刘向在刘安本子的基础上整理的,已经不是刘安的原本,所以他认为《楚辞》的最早定名、成书由刘向完成的是合乎他的认识向度的。但我们从学术史的角度仔细考察,王逸的话只说对了一半,成书于刘向没有说错,因为他所见的本子本来就是刘向新编的,版权完全可以

归之于刘向。可是如果说刘向定名《楚辞》,恐怕就有些不妥了。下面我们通过有关文献材料的佐证,对刘安首次编订《楚辞》的问题予以考述。

第一,《史》《汉》中大量文献材料证明,《楚辞》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流传。

秦汉时期,原楚国地区盛传“楚辞”,汉初的统治阶级也比较喜好,刘邦以“楚辞”作《大风歌》,刘彻以“楚辞”作《秋风辞》等,其六篇歌诗“受《楚辞》的影响很深”^[14]。由于武帝好辞赋,当时宫廷的士大夫和文人学士也风行辞赋,而且研习《楚辞》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,并成为升官仕进的一个阶梯,与当时武帝设的五经博士和推举的贤良文学并驾齐驱。武帝一度重用能诵咏《楚辞》的庄助、朱买臣等人。《史记·酷吏传》记载:“庄助使人言买臣,买臣以《楚辞》与助俱幸。”^[15]《汉书·地理志下》也说“吴有严助、朱买臣,贵显汉朝,文辞并发,故世传《楚辞》”。^[16]又《汉书·朱买臣传》:“会邑子严助俱幸,荐买臣。召见,说《春秋》,言《楚辞》,帝甚悦之。拜买臣为中大夫,与严助俱幸。”^[17]在司马迁、班固心中究竟“楚辞”是文体还是一部书册,我们难以知晓,所以《史》《汉》中,“楚辞”一词的标点,关系到“楚辞”的身份和命运问题。中华书局的标点本、简体字本都给“楚辞”加了书名号,证明他们倾向于作为一部书籍来看待。新近出版的刘跃进先生的《秦汉文学编年史》引文亦从之^[18]。尤其《汉书·朱买臣传》将《春秋》与《楚辞》连言,正说明朱买臣诵咏的是《楚辞》,不是“楚辞”。所以,朱买臣以言《楚辞》博得武帝欢心,元朔三年(前126年)受到重用,此时距刘安作《离骚传》有十二、三年时间,朱买臣得到的本子就来自刘安。

刘安整理编订《楚辞》的原因,我想除了个人的喜爱及有意迎合武帝酷爱辞赋的文学癖好外,还有更深一层的思想动机。这一动机和《楚辞》编订的时间密切相关。今天我们看不到刘安编订时间的文献记录,不过我们推断可以推断,搜集整理工作肯定在武帝即位之前就已开始,编订的时间极有可能在景帝削藩、吴楚反叛平定不久的时间内,也就是刘安经历第一次政治风波之后。吴楚反叛事件的威慑,朝廷削藩的日趋炽烈,父亲的冤毙,自己被朝廷猜疑等,犹如阴

魂般纠结在他心头,难以驱遣。他深感自己象屈原一样忠于朝廷,反而受到朝廷的猜忌训诫,于是他想通过编订《楚辞》转移朝廷对他的政治猜忌,显示自己忠于皇帝,维护中央权威,热心文学创作,热心学术研究的思想志趣,并假托屈原的忠君爱国,“信而见疑,忠而被谤”来表露自己思想的清白、政治上的遭遇,抒发内心冤屈的愤然之情。他托名淮南小山创作的《招隐士》,恰恰反映了他对宛如凶险山林充满杀机的汉王朝深深的忧惧。其《离骚传》所歌颂的屈原“与日月争光”的高洁品格,就是对自己品行的表白,也是递交给汉武帝的一份政治答卷。汉武帝命他作《离骚传》,恐怕很大程度上也具有试探刘安思想状态、政治志趣的目的,希望以此警示刘安,不要对父亲的事耿耿于怀,应该象屈原一样,即便受到冤屈,忠于朝廷的情怀应始终不渝。假如《楚辞》编订于景帝时期的推断不能成立,那么编订的最迟时间也当在汉武帝即位之后三、四年间,即我们所看到的《释文》目录一至九篇的《楚辞》辑本,严助、朱买臣所诵读的本子就是当时流行的这个本子。

第二,《楚辞》中西汉人作品主题较为集中,主要是为屈原的冤屈申述内心的忧愤。

除刘安的《招隐士》外,就《楚辞》中西汉人作品而论,皆如费振刚先生所言,“都照宋玉的办法,模仿屈原的口气,是代屈原去抒发他的那种怨愤情绪”^[19]。这些作品的抒情主人公都是屈原,而非作者本人,只有《招隐士》抒写的是作者自己的情绪。而且其他作品的主题都比较单一集中,就是为屈原的冤屈申述内心的忧愤。《楚辞》编辑的目的非常明确,体式统一而严密,只有《招隐士》属于另类作品。按照编选的体例,除了编辑者本人,有权利打破自定的编选原则,收录个人的另类作品外,换了他人是不可能这样做的。这也是刘安编辑《楚辞》时用淮南小山,而不用自己真实姓名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我们翻检今本《补注》,可以看到所有作品的作者都是有姓有名,只有《招隐士》例外。除了上述原

因外,恐怕和《招隐士》讽喻讥刺的主题有关。刘安以豺狼虎豹麋集、处处隐藏杀机的山林,喻比冷酷残暴的汉廷,呼唤朝中的“忧士”应尽早远离祸端,同时也在劝慰自己亦应远离朝廷,以此躲避祸患。这样的作品,刘安自然不敢署上自己的姓名,只有假托淮南小山才不致引起朝廷的猜忌,招致不测。

第三,刘安的地位、天赋,及所处的地域环境为其整理编订楚辞提供了可能。

武帝时期有两个好书的王侯,一个是河间献王刘德,一个是淮南王刘安,而且刘安有“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”的淮南文士集团^[20],无论规模还是文化成就都远远胜于河间献王。王逸在《招隐士·序》中对淮南文士“咸慕其德而归其仁,各竭才智,著作篇章,分造辞赋”的盛况大加赞赏。刘安的大力提倡,使当时的淮南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楚辞创作、形究中心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:刘安及门客的辞赋,大约占了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录屈原赋类的三分之一。淮南国都寿春是春秋战国时期蔡、楚两国先后的国都,特殊的地理条件,为刘安他们搜集编订《楚辞》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先天条件。距刘安一百多年的宣帝时期,淮南一带诵读研习《楚辞》的风气依然尚在。《汉书·王褒传》说:“宣帝时循武帝故事,讲论六艺群书,博尽奇异之好。征能为《楚辞》九江被公,召见诵读。益召高材刘向、张子侨、华龙、柳褒待召金马门。”^[21]九江,就是当年刘安的封地淮南国,刘安被迫自杀后,国除为九江郡。宣帝诏被公诵读《楚辞》的时间,刘跃进先生《秦汉文学编年史》系于宣帝元康五年、神爵元年(前61年)^[22],此时刘向只有16岁,编辑《楚辞》的可能性非常小,被公诵读的《楚辞》底本完全有可能就是刘安的本子。

通过以上论述,我们可以肯定古本《楚辞》成书于刘安及门客,刘安应是第一个编辑整理弘扬《楚辞》的人,其后有汉代的刘向、王逸,晚唐五代的无名氏,宋代的洪兴祖,最终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《楚辞补注》本。

[参考文献]

[1][2]洪兴祖,白话文点校·楚辞补注(修订本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2.

[3][10]金开诚,葛兆光·古诗文要籍叙录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5.

- [4]董乃斌·陈伯海·刘忠扬·中国文学史学史(第1卷)[M].石家庄:河北人民出版社,2003.
- [5]张伯伟·中华文化志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8.
- [6][12]李大明·汉楚辞学史(增订本)[M]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4.
- [7]姜亮夫·楚辞通故(第二辑)[M].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2000.
- [8]赵逵夫·屈骚探幽(修订本)[M].成都:巴蜀书社,2004.
- [9]汤炳正·屈赋新探[M].济南:齐鲁书社,1984.
- [11]李诚·楚辞论稿(增订本)[M]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6.
- [13]力之·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[M].成都:巴蜀书社,2005年.
- [14]程逸选注·汉魏六朝诗赋[M].广州:广东人民出版社,2004.
- [15]司马迁·史记[M].北京:中华书局点校本.
- [16][17][20][21]班固·汉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点校本.
- [18][22]刘跃进·秦汉文学编年史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6.
- [19]中国屈原学会编·中国楚辞学史(第6辑)[M].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05.

Liu'an's Contribution to the Current Version of "Chuci"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ok's Compilation

QIZi-yang

(Chinese Department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, China)

Abstract: "Chuci" was a literary genre that flourished in western Han Dynasty in Huainan Kingdom, the representative of South-China culture. Wangyi developed the compilation on Liu'an's basis and offered notes in the current general language. Scholars of the later generation commonly acknowledge that Liuxiang compiled "Chuci" ditties as a book while Wangyi gave them a former name. Literature on "Shiji" and "Han Book" and the contents to "An Interpretation on Chuci" suggest that "Chuci" as a book was subject to least 3 compilation by Liu'an, Liuxiang, Wangyi respectively, whereas until Southern Song Dynasty Hong Xingzu's work gave it a form in use today.

Key words: Liu'an; "Chuci";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ile and edit; Annotations of "Chuci"; the course of a book already in circulation